

决策框架如何对外交决策产生影响

——基于南宋对金政策的辩论

于海洋 张保杰

内容提要 外交决策理论有关决策框架的研究关注到两个相互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决策框架约束了决策者的认知和选择,另一方面,决策者利用决策框架对决策进行“语义操纵”。但是,既有研究对二者间的互动逻辑,缺乏更进一步的描述。框架垄断现象的剖析成为完善决策理论关于框架效应方面内容的切入点。垄断性框架的存在,加强了话语而非权力对决策的影响:它通过反向的语义操纵,限制了权力与替代性框架结合的可能;并依据“认知一致性”原则对不同的政策路线进行筛选。在南宋对金政策辩论的案例中,面对金衰蒙兴的地缘政治大变局,南宋朝堂围绕“绝金”还是“和金”展开了两次激烈的政治斗争。理学家利用框架垄断的优势,挫败了占据权力优势的相党推动“和金蔽蒙”之策,激进的联蒙灭金政策被采纳。该案例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话语对权力的反向控制及框架垄断可能造成

* 于海洋: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邮编:130012);张保杰:吉林大学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邮编:130012)

* 本项目为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2021年度重大招标项目“‘大一统’与中国传统国家治理研究”(项目编号:LSYZD21004)的研究成果。感谢《国际政治研究》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章疏漏和不足之处概由笔者负责。

的消极后果。

关键词 中国政治与外交 南宋 金国 决策框架 垄断性框架 语义操纵 政策辩论

嘉定7年(1215年)开始于南宋朝堂的“和金—绝金”辩论,构成了中国战略决策较具典型意义的历史场景之一。作为一个次等强国,南宋在面对衰落但尚有战斗力的金国及新兴且扩张倾向明显的蒙古时,做出完全不同于西方式均势原则的选择。这一选择风险极高,也被历史证明带来悲剧性后果,南宋继北宋靖康之耻之后第二次坐视甚至协助新兴强国灭亡邻国,最后孤独地面对敌人的侵略,在崖山终结了自己的命运。借助框架效应这一分析工具,可将两次廷辩及其背后的政治博弈作为一个案例进行分析,探讨中国独特的政治哲学、决策特质对重大外交决策产生的影响,以及决策受到垄断性框架不恰当干预的普遍性问题。

一、既有解释的缺陷

为什么南宋没有借鉴北宋联金灭辽政策失败的历史教训,再次选择联蒙灭金的高风险决策?既有解释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较为分裂。中国正统史观(包括《宋史》)出于为理学辩护的偏狭立场,掩盖了理学家们在重大政策问题上的情绪性反应及判断失误,把宋金关系破裂的责任推到权臣史弥远及其党羽身上,指责他们苟安误国,以致南宋抓不住金国衰落的机会。^①这种观点事实上回避了绝金的选择是否正确的问题,认为强硬路线不是问题所在,史弥远擅权误国、使南宋没有能力执行强硬路线才是问题所在。

第二种常见的解释是“党争论”。此种观点基本上回避了对“和金派”与“绝金派”观点的评估,或假定二者都有部分合理性。他们认为,两次朝堂辩论的核心问题在于相党与士大夫把意气之争带入国家大事,最终导致缺乏节制

^① 黄榦认为,“然自诸贤(笔者注:史弥远及同党)偷安日久,军政不修,百事废弛,将何以战?”参见(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5《复丰宅之淮西帅》,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629页。

的恶斗,任何一方的决策都无法贯彻下去。这种说法有其道理,嘉定7年后的政策辩论很快就超出了就事论事的理性范畴,双方都有清除异己、占据朝堂的明显举动,最终出现后方恶斗而前线军情无人问津的严重局面。^①当然,这种观点一定程度上将士大夫阶层面临的风险决策庸俗化了,回避了“和金派”最终接受了“绝金派”的意见,双方达成政策共识的事实,而且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此次政潮中弱势的士大夫反倒逼迫强势的相党一退再退,最终放弃“和金蔽蒙”之策。

第三种解释则是“夺土”说。很多宋金官员认为,战争爆发的原因在于金国存在侵略宋土以弥补对蒙战争损失的打算。金国部分大臣如术虎高琪持“请伐之以广疆土”的论调。^②南宋“绝金派”代表人物黄榦、袁燮也做此判断。^③如果此说成立,理学家们主张绝金、伐金就是有先见之明,不存在什么谬误问题了。但是,更多宋金两国史料证明,金宣宗宣战时明确将侵略宋土排除在选项之外,他不仅当着宋使的面否决了术虎高琪的建议,更在战争中反复重申“初岂贪其土地耶?联重惜生灵,惟和议早成为佳耳”。^④夺土只是双方少数官员的个人观点,不是两国真正的官方政策,这一点宋宁宗、史弥远及金宣宗之间不存在误判。

最后一种解释立足于宋金双边关系视角,认为情感、偏见、礼法等观念因素极大干扰了两国决断的理性程度。宋金两国最初都没有打一场七年大战(嘉定10年4月—嘉定17年3月)的打算。但是,靖康之耻的历史仇恨,宋金精英集团的相互鄙视,对局势恶化的作用极为显著。金国衰落后,仍视宋为小国,以伯侄关系看待宋金邦交,且认为比起宋高宗自称藩属时,金国对宋关系“恩赐亦已多矣”,^⑤因此,在岁币、礼仪等问题上坚持不做任何让步。南宋的理

^① 史弥远亲信赵方时任京湖制置使,嘉定10年,金军连陷南宋陈、光化、随、枣理、信阳、均州六州之地时,赵方却无法得到朝堂对于战和的指示。军情如火,赵方只能半夜把两子招来,“朝廷和战之说未定,观此益乱人意,吾策决矣,惟有提兵临边决战以报国耳。”遂抗疏主战,亲往襄阳。朝廷辩论3年,前线最高军事文官却无法得到指示,党争的混乱可见一斑。参见(元)脱脱等:《宋史》卷403《赵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204页。

^② (元)脱脱等:《金史》卷160《术虎高琪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344页。

^③ 黄榦认为“今既彼为鞑鞑所驱,失其巢穴,岂肯甘心处河南数州之地哉?其垂涎两淮以广其境土者非一日也”参见(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8《与金陵制使李梦闻书》。袁燮认为,“汴都四平,难以立国,欲夺我险要,为驻足之地。”参见(宋)袁燮:《絜斋集》卷三《论修战守札子》,文渊阁本《四库全书》。

^④ (元)脱脱等:《金史》卷150《宣宗纪中》,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43页。

^⑤ (元)脱脱等:《金史》卷88《纥石烈良弼》,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953页。

学家以“中国”自居,在重新燃起“报二圣之仇”希望后,对金国衰落后依然轻慢的态度更为不满,双方的负面情绪影响了决策理性。这一解释部分揭示了风险决策中非理性因素造成的决策偏差,但它无法解释南宋内部的政见分歧,也无从对南宋在差异化决策中进行选择的心理机制进行阐释。^①政治上保守成熟的史弥远及相党为什么会放任观念因素的干扰,放弃成熟的既有路线,拿国家政策来实践纯粹的理学理想呢?

历史无法假设,后人无法断定南宋选择“和金蔽蒙”之策是否就会避免亡国之祸。但是,一个次等强国放弃自身安全缓冲区的同时放弃均势制衡政策,一个有着靖康之耻深刻历史烙印的国家再次做出相同的风险决策,这种选择必然有着深刻的内部驱动力量。因此,借鉴目前学界已有的决策框架(decision framing)理论,有助于解释国家决策体系在做出重大对外决策时某种普遍性的问题。

二、分析工具的引入:决策框架

风险决策学说相信,决策对预期效应假定的偏离,源自决策者通过思维框架对外部信息进行编辑和评估的过程。决策框架既是理解和分析决策特殊性与差异性的前提条件,也是干预决策的重要变量。尽管直接使用决策框架作为分析工具的研究成果有限,但国内外学界还是基于不同理论范式,对决策框架问题进行若干讨论,也达成了一些共识。^②

1. 决策框架的相关定义。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维尔斯基(Amos Tversky)对决策框架概念做出经典定义。他们认为,“框架是决策者对与某个特定选择相关的行动、

^① 于海洋:《注定的失败:沉没成本与南宋对金战和困境》,《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年第5期,第66—74页。

^② 比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清敏基于“心理分析流派”“个性流派”“认知流派”的划分,讨论了“特定认知”对“特定政策”产生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尹继武系统分析决策者个人与小集团、公共舆论及特定群体包括认知相符、内群偏爱等在内的固有认知特点及缺陷。天津师范大学心理与行为研究院教授常光伟等学者则系统归纳了各种决策偏好对决策的影响形式。参见张清敏:《国际政治心理学流派评析》,《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3月,第72—74页;尹继武,《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知识谱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4期,第49—67页;常光伟等:《决策偏好研究述评》,《心理研究》2011年第4期,第10—14页。

结果和可能性的一种认知编辑。框架里包含决策者对环境中所提供前景的初步分析,是决策和判断的前提”,且“决策者采纳的决策框架部分受决策者的信念、习惯及个性控制”。^① 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詹姆斯·德鲁克曼(James N. Druckman)也观察到,“所有政治参与者”都使用语言来定义所面对问题并赋予其含义,“将这种语言线索与更大的政治环境联系起来的过程被称为框架”。^② 无论把决策框架定义为“认知编辑”还是“语言”,其本质都是决策者对外部世界独特的解读方式。决策框架可能来自决策者对决策信息的主动编码和加工,也可能是受他人提供和包装信息影响的结果,二者都可以对决策者在决策中的选择范围施加干预。

决策框架“强调分析过程在指导选择行为中的运作”,其作用机制指向语言对判断的直接影响。^③ 大量心理学的实验证明,不同表述形式哪怕包含了相同的信息,决策者也会出现偏好的转移。以色列赫兹利亚跨学科研究中心大学亚历克斯·明茨(Alex Mintz)教授使用术语“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s)来指代这种同一决策问题的不同描述产生不同反应的实验结果。^④ 框架效应是决策框架发生作用的典型场景,其存在反映了决策者受到认知偏见干预的普遍性。

2. 决策框架的作用形式。狭义的决策框架主要在决策中承担信息编辑、确定自身损益状态的功能。随着研究深入,学者们开始从更为多元的视角定义框架的作用形式。^⑤ 依据决策者与决策框架的关系,决策框架最典型的作用形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种:

第一,决策框架调节和约束了决策者的认知,这一功能发展到极致就是垄断性框架(Hegemonic Framing)的出现。此时,决策者完全受制于某种特定框

^① Amos Tversky and Daniel Kahneman, “The Framing of Decisions and the Psychology of Choice,” *Science*, Vol.211, Issue 4481, 1981.

^② James N. Druckman and Rose McDermott, “Emotion and the Framing of Risky Choice,” *Political Behavior*, Vol.30, 2008.

^③ Amos Tversky and Daniel Kahneman, “The Framing of Decisions and the Psychology of Choice.”

^④ Alex Mintz and Steven B. Redd, “Framing Effec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ynthese*, Vol.135, No.2, 2003.

^⑤ 比如,预期理论、查询理论和痕迹模糊理论对决策框架的作用机制理解就有所不同,分别强调参考点、记忆查询顺序和对信息要义痕迹(gist)对行为的影响。参见史燕伟等:《公共决策中的框架效应:理论解释及影响因素》,《心理科学进展》2014年第8期,第1304—1306页。

架,“没有可以为公众提供替代性选择的相反框架对其进行挑战”。^① 总体而言,决策框架是通过对信息进行过滤起作用的。从作用机理看,尽管“没有理由相信最易获取的特征跟一个好的决策有最大的关联”,但决策框架的功能正是在决策者和决策信息间形成了关于“易获取性”的信道。通过建构决策者对外部世界解读的独特方式,决策框架过滤各种重要但被定性为“不易获取的特征”,使“高度的易获取的特征”对决策起到了超出比例的重要性。^② 由于决策框架可以扭曲决策者对特定问题的认知,可选择的框架越少,往往意味着决策者认知的扭曲程度越高。因此,很多学者将决策框架尤其是垄断框架与决策偏见等同起来。依据框架对决策者影响的差异,爱荷华大学心理学系教授欧文·P·莱文(Irwin P. Levin)等将决策框架划分为风险选择框架(risky choice framing)、属性框架(attribute framing)和目标框架(goal framing)等多种类型。比如,风险框架对决策者采取风险接受(risk-acceptant)还是风险规避(risk-aversion)型政策施加影响,属性/目标框架则关注某一特定属性或目标对决策者心理产生的正/负向影响。^③

第二,决策框架构成决策者实施“语义操纵”(semantic manipulation)的工具,这一功能发展到极致就是决策者权力对决策框架的完全控制。罗格斯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杰克·利维(Jack Levy)指出,“通过操纵决策问题的框架来影响策略选择可能比直接影响策略更容易”。^④ 实验证明,决策者“可以通过选择性地呈现信息和使用带有特定倾向的词语和短语,对结果进行语义操纵”。^⑤ 语义操纵既是一个心理现象,同时还是一个政治现象,它反映了决策领域内权力与语言的结合:决策者通过刻意强/弱化某个特定框架,干预决策的走向。决策者无法摆脱语义操纵的诱惑,不仅因为设置议程、推动对话本就是政治制

① Héctor Perla Jr., “Explaining Public Support for the Use of Military Force: The Impact of Reference Point Framing and Prospective Decision Making,”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5, No.1, 2011.

② 李永鑫、黄宏强:《卡尼曼的心理学思想述评》,《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第155页。

③ Irwin P. Levin, et al., “All Frames Are Not Created Equal: A Typology and Critical Analysis of Framing Effect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Vol.76, No.2, 1998.

④ Jack Levy, “Prospect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etical Applications and Analytical Problem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13, No.2, 1992.

⑤ William A. Boettcher III, “Military Intervention Decisions Regarding Humanitarian Crises Framing Induced Risk Behavio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48, Issue 3, 2004.

度赋予政治家的权力,更因为政治权力需要语义操纵的配合,才能转化为政策实践。明茨教授和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教授史蒂文·里德(Steven B. Redd)基于“语义操纵”这一前提,把决策框架分为主题框架(thematic framing)、结构框架(structural framing)等多种类型。框架的划分标准主要依据决策者试图操纵决策过程中的哪些要素。比如,主题框架的功能是将符合决策者意志的特定主题引入政治过程,决策结构框架则研究更改信息排序对决策的干预,“通过替代,维度或混合方式,结构框架会影响信息处理和外交政策选择”。^①

决策框架与决策者的相互施动关系,反映了决策者被偏见干扰又利用偏见的复杂情形。在重大政治决策中,两种作用形式代表了两种可能性:语言影响权力,抑或权力影响语言;确定决策更偏重于那种情形,成为理解决策的最重要前提。很多情境下,这两种可能性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复杂地并存着。

3. 决策框架的影响因素。总体而言,作为决策者内心世界与外部环境的桥梁,决策框架部分是由问题形式决定的,部分是由社会规范、习惯和决策者的性格特征决定的。^②主客观因素的嵌套对决策框架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决策框架受到具体情境的约束。决策发生的领域、时间压力等“背景情况和情势因素都会对个体选择和行动产生影响。”^③比如,研究表明,某些问题领域出现框架效应的概率远低于其他领域;^④又比如,框架信息细节的完整程度会影响决策者对风险接受/规避框架的偏好;^⑤再比如,决策的时间压力会与决策框架的冒险倾向成反比:在部分实验中,当时间压力消失时,框架效

^① Alex Mintz and Steven B. Redd, “Framing Effec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ynthese*, Vol.135, No.2, 2003.

^② Scott Plous, ed., *The Psychology of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New York: McGraw-Hill, 1993, pp.107-108.

^③ 林民旺:《选择战争:基于规避损失的战争决策理论》,外交学院2005级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第46页。

^④ A. M. O'Connor, et al., “Framing Effects on Expectations, Decisions, and Side Effects Experienced: The Case of Influenza Immunization,” *Journal of Clinical Epidemiology*, Vol.49, No.1, 1996. 1.

^⑤ Durairaj Maheswaran and Joan Meyers-levy, “The Influence of Message Framing and Issue Involvement,”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Vol.27, No.3, 1990.

应也会随之消失。^① 不同问题中,环境传递信号的清晰程度及其带给决策者压力差异显著,在一些情形下,环境压力能够使决策框架丧失对决策者的影响,另一些情形则相反。

其次,决策框架与决策者的认知局限密切相关。重大决策通常是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下做出选择,决策者认知体系中的谬误、偏好及情绪性因素会被不确定的环境放大,认特定信息或情境的“易获得性”——即特定的认知内容出现在决策者脑海中的概率——因此出现了很大的差异。^② 认知局限增加了决策者受到语义操纵的几率。比如,丹尼尔·卡内曼和阿莫斯·特维爾斯基在著名的“‘新生儿的男孩’概率”实验中发现,决策者会经常出现“小数法则”这样典型的框架偏差,即决策者会把自身所熟悉经验的价值不恰当放大,将其作为参照系处理其他案例。此时,从小样本和大样本中得到的经验平均值被赋予相同的概率分布,并违反了概率论中的大数法则。^③

最后,决策框架的作用程度与替代框架(alternative framing)是否存在密切相关。重大的政治决策通常存在不止一条路线。垄断性框架的存在意味着决策者面对问题时缺乏其他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哪怕决策者有能力反对垄断框架,也只能降低该框架的可信性,却无法扭转决策倾向。如果出现替代性的决策框架,情况则完全不同。替代性框架起到很强的竞争作用,“当决策者暴露在竞争的框架内,框架效应的作用就会减小或消除”。^④ 替代性框架会拉平“易获得性”曲线,使不同类型的情境或信息获得更为充分和平衡的关注,抑止了认知对外部环境的扭曲。替代性框架的竞争消解了语言对决策者的控制,转而增加了权力对不同路线的选择权利。

① Eldar Shafir, “Choosing versus Rejecting: Why Some Options Are both Better and Worse than Others,” *Memory & Cognition*, Vol.21, No.4, 1993.

② E. T. Higgins, “Knowledge Activation: Accessibility, Applicability, and Salience,” in E. T. Higgins & A. Kruglanski, eds., *Social Psychology: Handbook of Basic Principles*,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96, pp. 133-168.

③ Amos Tversky and Daniel Kahneman, “Belief in the Law of Small Number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76, No.2, 1971.

④ Héctor Perla Jr., “Explaining Public Support for the Use of Military Force: The Impact of Reference Point Framing and Prospective Decision Making,”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5, No.2, 2011.

三、案例验证：宋金和议中的框架效应

嘉定元年(1208年),南宋在开禧北伐失败后,以屈辱的条件与金国达成嘉定和议,两国实现和平。嘉定6年(1213年),统一蒙古诸部的成吉思汗突破金长城防线,嘉定7年(1214年)包围金中都。金国国势不振,使理学家们开始考虑宋金关系的重置。围绕“绝金”还是“和金”,不同政治势力开始了长达五年的辩论。

1. 第一次政策辩论:嘉定7年—10年(1214—1217年)御前辩论的框架效应。在金国面临蒙古挑战之前,南宋对金的决策框架基本上是清晰的。史弥远在嘉定和议前概括其对金态度是,“若夫事关国体、宗庙社稷,所系甚重,诘可举数千万人之命轻于一掷乎?……毋惑浮言以挠吾之规,毋贪小利以滋敌之衅,使民力愈宽,国势愈壮,迟之岁月,以俟大举,实宗社无疆之福”。^① 理学士大夫们基本上认同史弥远的观点。以理学领袖人物真德秀为例,他尽管对史“一惟其(笔者注:金国)意,独不滋媿我之意”有微词,但承认和议是符合南宋利益的,“寻盟继好,休息有期……有养其事力,以待可为之机。”^②直到嘉定6年(1213年)十二月,真德秀在出使金国途中,提出新的对金政策纲领性文件“祈天永命六条”时,其主张仍然是“舍一时之近效,恢长世之远图”,加强内政建设强化国力,以待时变。^③ 比较史弥远和真德秀的观点,起码在嘉定6年,他们的决策框架都秉承南宋历史上传统的“自治”论观点,即以和平换取时间,修德政,厚国力,在有必胜把握时才讨论对金战争的问题。

这一决策框架随之理学家们目睹金国衰落发生动摇。嘉定7年(1214年)—10年(1217年),南宋朝堂面对金国衰落、蒙古崛起这一共同问题,旗帜鲜明地划分为两派,对局势描绘出截然相反的政策路线(强调“绝金”的好处还是“绝金”的风险)。这一政争完全符合框架效应关于“逻辑等同(但表述相反)的短语导致决策者改变了其偏好”的假定,因此,构成了重大决策中框架效应研究的经典案例。

嘉定6年(1213年),真德秀出使金国,此行使其获得“知边事”的发言权。

① (元)脱脱等:《宋史》卷414《史弥远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416页。

②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万有文库本),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1页。

③ 同上书,第41页。

在目睹金国糟糕的安全态势后,真德秀对金国的认识出现明显的心态变化。嘉定7年(1214年)二月,真德秀返回南宋时,基于对蒙古的警惕,真德秀还认为“和金蔽宋”是最理想的政策。^①及至同年七月,金国正式遣使来告被蒙古威逼迁都,真德秀已经转向鼓吹金国速亡论。^②在七月二十五日的奏折中,真德秀认为,绝金岁币、加强南宋自身武备是上策,削减岁币是中策,正式建议停止向金进贡岁币,掀起对金政策辩论。^③到十一月,他的立场则更加激进,认为南宋“申中国之志”和“报靖康之耻”的时机已到,灭亡金国成为上策,绝金岁币变成次优选择,至于继续向金国输纳岁币,则是“若谢玄之助苻丕”那样既荒谬又卖国之举了。^④

真德秀的立场获得了理学士大夫的集体支持,他们将岁币视为违背理学理念的不得已之举,金国衰落意味着妥协的前提已不存在。朱熹临终时指定的理学学术领袖黄榦,在给史弥远的公开上书中提出,“当彼危亡之余,而吾国尚行全盛之礼,已是为中国之辱”。^⑤国子监祭酒袁燮、郑性之等理学中人纷纷表态声援。袁燮宣称,“堂堂大朝,卑辞厚礼,谨奉垂亡之国,自示削弱,谁不侮之?”主张截留岁币加上自身军队建设。^⑥代表士林声音的太学生坚定站在理学家身边。嘉定7年(1214年)十一月,朝廷决定按惯例派遣使臣向金主贺正旦,太学诸生集体上书反对。听闻乔行简主张维持岁币后,以黄自然、黄洪等人为代表的太学生升级了抵制的烈度,集体伏阙丽正门请斩乔行简以谢天下。^⑦岁币问题

① “万一外夷(笔者注:蒙古)得志,必欲灭元颜之宗,干戈相寻,为力弗敌,免彝彘突,迫吾边垂,又将何以御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万有文库本)(卷3)《使还上殿札子》,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46页。

② 真德秀认为,以金为屏蔽的做法无异于“以朽壤为垣以望其能障盗贼也”。参见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万有文库本)(卷4),《除江东漕十一月二十二日朝辞奏事札子一》,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60—61页。

③ “其货币颁犒诸军、缮修戒备,于以激士心而褫敌气,此上策也。命疆吏移文与议,削比年增添之数,还隆兴裁减之旧,此中策也。彼求我与,一切如初,非特下策,几无策矣。”参见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万有文库本)(卷3)《直前奏事札子》,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54页。

④ “练兵选将,直捣虏巢,若勾践袭吴之师,此上策也。按兵坚垒,内固吾圉,止使留币,外绝虜交,若晋氏之不与敌和,而鉴其宴安江沱之失,此中策也。以救灾恤邻之常礼,施之于茹肝涉血之深仇,若谢玄之助苻丕,此下策也。”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万有文库本)(卷4),《除江东漕十一月二十二日朝辞奏事札子一》,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59—60页。

⑤ (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28《代人禀宰执论岁币》,《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711页。

⑥ 袁燮:“夫今之所患者,财用未充也,然岁币之数,不为不厚,足以募勇敢,足以旌战功。自今以往,边防于此取办,国威由此复伸。”参见袁燮撰,李翔校:《絮斋集》卷3《论修战守札子》,卷4《论北边札子一》,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⑦ (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甲集《“请斩乔相”条》,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2页。

成为理学家们全面批判和重新定义宋金关系的导火索。饶有深意的是,黄榦在与友人的私信中专门记录下:嘉定6年(1213年)冬也就是真德秀返回临安时,太学生黄自然专程拜访过他,且获得其举荐。^①若干细节都暗示,由真德秀发动的绝金岁币之议实际上激进的理学士大夫集团发动的一场有组织的政治运动。

面对“绝金派”挑起的论战,“和金派”官僚对绝金岁币这一替代性框架带来的风险忧心忡忡。史弥远独相后,为免非议很少公开发表政见,“和金派”站在前台的人物主要是乔行简和程秘。程秘明确反对真德秀关于金“速亡”的判断,断定挑衅金人不利于宋,“(笔者注:金)国未大乱,上下严密,虚实难测,不可视为垂尽之敌人。其国势虽弱于蒙古,与宋则难分伯仲。如今迁都于汴,与宋境土密接,又亟需南宋钱粮,若不予岁币,必启兵端。”^②嘉定9年(1215年),淮西提举常平乔行简在判断金国“其国犹未大乱……未易遽以垂尽之虏视之也”的基础上,进而指出用岁币来支持金国继续抗蒙的必要性,“金,昔吾之仇也,今吾之蔽也。古人唇亡齿寒之辙可覆,宜姑与币,使得拒鞬”。^③虽然“绝金派”的郑性之认为“完颜氏自亡而不暇,岂复敢与我敌哉!”^④乔、程二人素有名臣之称,有丰富的实务经验,对复杂局势的判断比更擅清议的理学之士有说服力得多。在僵持局面下,嘉定9年(1216年)二月,任江淮制置使的前线帅臣李珣上书主张绝金,此举极大增强了“绝金派”说辞的可信性。^⑤

回顾嘉定嘉定7年—10年(1214—1217年)第一次对金政策辩论,双方争论的表面问题是岁币,但所争议的实际内容则远过于岁币,涉及到宋金关系的平等性、金国灭亡的可能性等诸多问题。“绝金派”的优势在于伦理、情感与预期层面:理学家们认为,旧的嘉定和议对宋而言是绝对的损失状态,他们以岁

① 黄榦在与李敬子的书信中写道:“去冬有蜀人家字本仲者来访,与之语涉月,极不易得。多读书,持身甚介,玩理甚精,务学甚实,於贯之(李道传)伯仲耳。近来诸生伏阙之书,虽是次名,实则首谋。故书中言蜀事,最详且切,已试中优等。”参见《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三《与李敬子司直书》,《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50页。

② (宋)程秘:《洺水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13《上执政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121页。

③ 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甲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3页。

④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卷147,第3773页。

⑤ 江淮制置司与京湖、四川制置司并列为南宋对金/蒙的三大战区。作为江淮制置使的李珣,是当时最有发言权的前线军事文官之一。李珣在绝币之议及其后的宋金战争中与黄榦等理学家一直互通声气,保持了密切的书信往来,其幕府据考证更是半数来自长期持强硬立场的“福建、朱门系人物”。由于南宋理学的发展有很强的地域色彩,继承朱熹学术和政治立场的理学家很多籍贯福建且有密切的师承和姻亲关系。参见小林晃:《南宋后期史弥远专权内情及其嬗变》,《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20年第3期,第61页。

币问题为抓手对和金政策的正当性进行了猛烈抨击,其观点由岁币问题延伸到“申中国之志”和“报靖康之耻”的收益预期上。此观点即便在嘉定和议形成的旧政治共识中,也是“和金派”不能否定的。“和金派”基本回避了其主张的政治正当性问题,所争论的仅仅是政策可行性——冒失的绝金岁币可能造成宋金战争、蒙古得利:相对于宋金和平的现状,战争将会是绝对的损失。

总体而言,第一次政争符合前景理论对框架效应的基本假定,“绝金派”获得胜利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宋金世仇未报,且大量情报显示金国无力充当南宋的屏障(主要来自蒙金战争前期,金国糟糕的表现和被迫迁都造成的震动),士大夫集团倾向“金国速亡论”有足够的情感和认知基础。

2. 第二次政策辩论:嘉定 11 年—12 年(1218—1219 年)绝金框架取得全面优势。第一次辩论“绝金派”占据上风,但由于主和派握有实权,最后南宋只是妥协性的暂停输送岁币。事实证明,南宋低估了金国的战斗力,也低估了金国逼迫南宋缴纳岁币的意志。嘉定 10 年(1217 年)金国南侵,宋军在战场上遭受屡遭败绩。^① 京湖战场上宋军一开始就连败六阵。^② 主战派李珣领导下的江淮战线更是没有胜绩。尽管理学士大夫极力为其遮掩,嘉定 11 年(1218 年)李珣发动的泗州之战仍留下惨败的零星记载。^③ 南宋边境地区“悉为志(纥石烈志)军所残,原野萧条,无复人迹”。^④

前文已经指出,决策框架是受到外部环境约束的。战争爆发及失利形成了严重的外部压力,虽然南宋此时尚不知道成吉思汗即将西征、金蒙战争进入

① 自嘉定 10 年(1217 年)至嘉定 11 年(1218 年),金军以宋背盟为由南下,数次击败宋军。例如,兴定元年(1217)五月戊午,以宋遣兵数犯境,及岁币不至,诏谕沿边罪宋。八月己酉,海州经略司表官军与宋人战石湫南,战涟水县,战中土桥,宋兵败绩。癸丑,宋人攻确山县,为官军所败,诏谕国内军士,使知宋人渝盟之故,仍命大臣议其事。乙卯,集贤院谏议官朱盖上书陈御敌三策。壬戌,海州经略使阿不罕奴失刺败宋人于其境。九月己卯,蔡州帅府使宋人将窥息州,以轻兵诱其进,别以锐师邀击之,虏其将沈俊。冬十月甲寅日,息州帅府报告在中渡击败了宋军。十二月甲寅日,海州经略使报告提控韩璧在盐仓击败了宋军。兴定 2 年(1218 年),二月癸卯,宋人侵青口,行枢密院遣兵败之。丙午,讹可败宋人于防山。庚戌,海州经略败宋兵于胸山,表请继其军储,督东平帅府发兵护送资粮以应之。三月庚辰,癸未,讹可败宋人于光化军。戊子,讹可表言,官军自桐柏入宋境,所向多克捷。……夏四月丁巳,陕西行省破宋鸡公山,取和州、成州,至河池县黑谷关,守者皆遁,前后获粮九万斛,钱数千万,军实不可胜计……详见(元)脱脱等:《金史》卷 15,《宣宗中》,北京: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329—341 页。

② (元)脱脱等:《金史》卷 113,《完颜赛不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2480 页。

③ “俄而我出泗上,师失利,虜大入”、“京口一军,自泗州失利之后,缺额极多,老弱大半”,参见(宋)刘克庄著,辛更儒校注:《刘克庄集笺校》卷 147《毅斋郑观文神道碑》,北京: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5809 页。

④ (金)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卷 19《内翰冯公(璧)神道碑铭》,北京:国家图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31 页。

对峙阶段等重要情报,但“绝金派”已经意识到了金国速亡论”的错误。此时,两国谈判的大门没有完全关闭。在这种情况下,朝堂对宋金关系进行第二次辩论无可避免。

出于为尊者讳的传统,关于强硬派理学家们决断失误后反应的留存史料不多,几则史料能够流露出他们反思的痕迹。黄榦在公开场合坚定主张绝金岁币,但战争爆发后他被太学生们视为奸佞要行诛杀的乔行简去信,在私信里对绝币、伏阙等行为不以为然,并将乔称赞为“通儒有用之学”的名臣。^①相反,黄榦对主战派帅臣李珣及其任用的以闽籍理学人士为主体的僚属评价则颇低,“其时幕府书馆,往往轻儇浮靡之士。”^②李珣幕府任职的刘克庄感受到了军事失利后政治气候的变化,因此抱怨到,“某初入幕,朝野盛言虏衰,及泗上一跌,始息进取之谋……于时金陵人情震动,外议以边面无备,归怨幕画。某在幕最久,得谤尤甚”。^③刘克庄没有将谤己者斥为小人,而是含糊归结“人情”,与上文黄榦的表态比照,可以猜测发出非议者也包含理学人士。至于真德秀,在宋金战争爆发前夕就一改嘉定7年时激进的态度,不再鼓吹北伐亡金的速胜论。在嘉定9年(1216年)12月奏折中,真德秀立场重回嘉定6年“祈天永命”折中“亲信仁贤,修举德政”的主守主张,不再讨论伐金问题。^④自此之后,尽管战争进程跌宕起伏,真德秀本人却再没有对战争做任何议论。“绝金派”另一位领袖人物袁燮也不再强调“金国速亡论”,只能用金国“夺土论”的流言给自己辩解,“讲和却是省事,但虏人之意不专在岁币,难与通和”。^⑤从强硬派理学家态度的微妙变化中可以看出,他们已经意识到判断错误,对前线糟

① “闻虏之入寇,大抵以岁币为主。三两年间,所谓书生者,皆以免岁币为请也。榦虽至愚,亦切笑之。惟某官(笔者注:乔行简)毅然力排众论。至于今日,而其验已如此,则通儒有用之学,非若世之不达时宜者。”参见(宋)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29《与淮西乔运判辨起夫运粮事》(《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年版,第622页。

② (宋)郑元肃:《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嘉定十一年二月,《宋集珍本丛刊》卷68,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840页。

③ (宋)刘克庄著,辛更儒校注:《刘克庄集笺校》卷147《毅斋郑观文神道碑》,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809页。

④ 真德秀:《除江东漕十一月二十二日朝辞奏事劄子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万有文库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13页。

⑤ 事实上,金朝在战争中的态度始终明确,无意长期两面作战,对宋作战的目标一为财力极度困窘的金国获得岁币,二警告宋不要背盟。金尚书左压高汝砺主张出兵时指出,“今宋弃信背盟,侵我边鄙,是曲在彼也”。参见(元)脱脱:《金史》卷107《高汝砺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358页。金宣宗对战争目标的总结是“此举盖为宋人渝盟,初岂贪其土地耶联重惜生灵,惟和议早成为佳耳。”《金史》卷15《宣宗纪中》,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43页。

糕的态势也缺乏解决之道。

至于“和金派”，则一直没有放弃和金的打算。在史弥远的授意下，南宋停止输币的借口是蒙金战争导致运输不便。在战争爆发两年后的嘉定 12 年（1219 年），朝廷与金的岁币仍然被完整保存在府库内，这表明史弥远仍在为支付岁币做准备。^① 同时，作为南宋最有权势、在位时间最长的权相，史弥远并不惧怕开罪强硬派士大夫。战争还未爆发，史弥远就把“绝金派”领袖真德秀贬谪到地方。嘉定 11 年（1218 年）五月，糟糕的战局使最初明确支持绝金岁币的宁宗态度动摇，下诏“侍从、台谏、两省官集议平戎、御戎、和戎三策”；八月，史弥远指使亲信胡榘上书，要求惩处“绝金派”代表人物：“残虏本无能为，陛下爱兼南北，初未有征伐意，内因廷臣横议，外而边臣邀功，使边境久未安。”^② 胡榘指控导致兵祸的廷臣，是真德秀、袁燮等人，所谓边臣就是李珣了。嘉定 12 年（1219 年）李珣作为泗州战败负责人遭到弹劾并被剥夺职位。^③ 已经升为礼部侍郎的袁燮也被革职。至此，嘉定 7 年主张绝金岁币的代表人物基本被清理出朝堂，史弥远展现出自己打压“绝金派”的意志与能力。

令人疑惑的是，在“绝金派”备受非议、纷纷贬谪而“和金派”权势大张的情况下，第二次对金政策辩论却朝着完全有利于“绝金派”的方向发展，推动了国家逐步转向联蒙伐金的政策路线。为什么史弥远的权势无法转化为“语义操纵”，使和金御蒙的政策框架被士大夫阶层接受呢？一个业已失败的政见成为垄断性框架，被朝堂延续下去，这意味着需要对语言—权力关系进行更深入的理解。

回顾第二次辩论过程，面对史弥远的打击，“绝金派”士大夫反击的武器惟有“公论”。真德秀早在嘉定 7 年的奏折中就强调，“公论，国之元气也……绍兴之际，和议为不可恃者，公论也。秦桧讎而嫉之，遗患至今”。^④ 堵塞言路，在理学看来是最权臣乱政的信号；恢复秦桧的谥号，则是史弥远在嘉定议和时广为诟病的举措。秘书监柴中行、国子监丞萧舜咨等主张绝金的官员们纷纷上

① 程秘所撰之《朱惠州行状》载，朱权于嘉定“十二年，秩满赴部，朝廷以作邑有声，差监行在左藏东库。时金虏渝盟，岁币积于左帑，几二百万匹，寝有损腐。”参见程秘：《程端明公谥水集》，《宋集珍本丛刊》卷 15，北京：线装书局 2004 年版，第 140 页。

② 程秘：《程端明公谥水集》，《宋集珍本丛刊》卷 82，北京：线装书局 2004 年版，第 2171 页。

③ 刘克庄：《刘克庄集笺校》卷 93，《玉牒初草》嘉定十二年六月癸未条，北京：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3651 页。

④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万有文库本）（卷 3），《直前奏事札子》，北京：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第 61 页。

书,要朝廷要尊重“天下之公言”、不能“使吾君有拒谏之失”。^①嘉定11年(1218年),袁燮公开给宁宗上奏折,以要求“国家多事之秋(笔者注:宋金战争),有大议论,有大更张,必得人以共图之”的理由,要求增置宰属,改变史弥远专权的局面;^②黄榦等纷纷上奏呼应。嘉定12年(1219年)胡榘上书要求惩处“绝金派”,更引发了士林的激烈反击。尽管是否“和戎”是宁宗下诏要求讨论的,但“太学生何处恬等还是在五月己亥伏阙上书,以工部尚书胡榘欲和金人,请诛之以谢天下。”据记载相率上书的太学生竟有273人之多,规模超过嘉定10年(1217年)伏阙事件。^③袁燮更是在朝会上公然试图殴打胡榘。由太学生和理学家们联合掀起的公论,把辩论焦点由和金绝金转向了尊重公议还是钳制言论上,最终成为对史弥远专权的大规模批评。总体而言,在嘉定11年(1218年)开始的对金政策辩论中,强硬派转变了辩论策略,拒绝讨论和金、联蒙等具体政策问题,将论战焦点转移到言路畅通、宰相擅权等内政问题上,政治话语的框架重新回到理学士大夫极为熟悉的“自治”逻辑——即安内自能攘夷,对金的抵御无力原因在于史弥远主政无能。

“绝金派”可以通过转换框架主题将辩论延续下去,负实际政治责任的官员则必须考虑战争爆发带来的现实问题。崔与之是南宋中晚期中立派大臣的代表人物,以才干著称。同时,崔不是理学之士,对理学曾有“无以学术杀天下后世”的激烈批评。^④泗州之战前,崔与之在李珣手下任安抚使,一直劝李珣持重。泗州之败后,崔与之极为愤怒,曾感慨“今以万人之命,坏于一夫之手!”但是当史弥远希望他替代李珣任职时,崔与之明确拒绝。^⑤史弥远急于对金求

① 俞文豹:《吹剑录全编》,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09页。

② 袁燮奏议道:“今陛下更化以来,垂意宰属,精选才能之士,以戢堂后官之奸,可谓盛举矣。然政事不胜其多,而宰属不过数人,耳目不能徧察,思虑不能周知。速则卤莽,缓则壅滞。甚非所以弥缝宰辅也。而况边境未宁,干戈未息,正国家多事之秋,有大议论,有大更张,必得人以共图之。自从臣以下,谒见宰辅,月不过一再尔。岂能如宰属之无时不见,款密无间哉。当世所切,不容少缓。伏惟陛下明诏二三大臣,增置宰属。”参见(明)杨士奇等辑:《历代名臣奏议》卷162,《燮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123—2124页。

③ (宋)刘时举:《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卷15)《宁宗·嘉定十二年》,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66页。

④ 罗炳良:《菊坡学派与岭南史学》,《学术研究》2010年10期,第119—124页。

⑤ 虜先犯浮光,清献(崔与之)又劝李公(李珣)持重,俄而我出泗上,师失利,虜大人。庙谩以咎归李公,议擢清献代之,俾续和议,先贻书论上意。清献力言,虜垂亡不可和,李公不可去。参见(宋)崔与之撰,张其凡、孙志章整理:《宋丞相崔清献公全集》附集卷三《崔菊坡与刘制置书》,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3—214页。

和,崔与之又三次拒绝,理由是“彼(笔者注:金国)方得势,而我与之和,必遭屈辱”。^①事实上,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与仇恨的增加,崔的观点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很多士大夫起初不支持“绝金派”的主张,也不相信南宋有灭金的能力。但是,在大战爆发之后,他们基于爱国主义立场和迎战的考虑,不愿见到内讧,同时希望在赢得胜利后获得更好的谈判地位,因此,反对史弥远过于着急的求和举动。这些人加入理性家掀起的公议,使坚定的“和金派”也无能为力。

四、新假定的提出:理学框架垄断对相权的语义操纵

使用决策框架概念,“绝金派”不顾一切的政争态度可以被视为一种认知局限。但是,这一概念无法解释为什么“和金派”在对“绝金派”的认知局限有清醒认识且长期执政前提下,无法通过“语义操纵”推动“绝金派”接受原来的框架?同时,既然实验数据已经证明,信息的清晰程度会极大降低认知局限出现的概率。^②那么,为什么明确的“金尚能战”的信息,不能推动“绝金派”进行框架转换?修正决策框架研究的缺陷,进一步厘清框架与权力的关系,有助于解决以上疑问。

1. 既有研究在解释对金政策辩论问题上的不足。决策框架概念对于风险决策理论研究极为重要,但其规范研究程度却远有不足,没有发展出关于框架形成、框架背景、框架—主体关系等重要问题的系统性理论。因此,“社会科学建模中使用框架成为一个严重的方法论问题”。^③研究盲点的长期存在降低了框架理论对重大政治决策的解释能力。这其中有两个问题最为凸出:

第一,既有研究脱胎于背景设定较为简单的心理实验,总体上对决策框架所依存环境的复杂性缺乏足够认识。心理学范式从单一视角解释了决策偏差和决策失败现象,但是,现实中的政治决策尤其是重大政治决策,总是产生于更为复杂的决策者—决策环境互动中,“多重参考依赖”现象在决策集团内广

① (元)脱脱等:《宋史》(卷165)《崔与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259页。

② Durairaj Maheswaran and Joan Meyers-levy, “The Influence of Message Framing and Issue Involvement,” pp. 361-367.

③ Alex Mintz and Steven B. Redd, “Framing Effec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93-213.

泛存在。^① 脱离框架产生的政治环境,就无法对具体情境中框架与决策者的复杂关系进行准确定位,也无法对语言—权力关系在相关案例中的偏重加以判断。

对金政策的决策框架,最突出特征就是理学话语在嘉定年间确立的垄断地位,以及理学内部语言与权力的分离。这既与西方决策框架理论假定权力—话语间存在密切关系的假定相悖,也不符合后人对大一统原则的想象。程朱理学独特的崛起历程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这种独特的话语现象。理学袭承自二程洛学之说,后经朱熹、陆九渊等人发展,逐渐获得士大夫阶层的认同。南宋君权的虚弱与国力的积弱,为朱熹等理学家呼吁政治“大更张”提供了时代背景。理学家们为了刷新政治,对朝堂的沉闷及政治调和论持激烈批判态度,对“群贤”执政有当仁不让的责任感,这使其不为执政者所喜,与其余学派的关系也很紧张。^② 韩侂胄专权时理学家们甚至遭遇了庆元党禁这样的重大挫折。长期在政治打压下求存,理学相对于行政权力的独立性较高:理学家们虽然也努力在朝堂上找到政治代理人,但长期的在野经历,使他们更依赖讲学、传道、撰文、公议等话语手段获得政治影响。南宋历史上,理学的学术领袖与政治领导者从未重叠过,前者对后者抱有怀疑态度和监督责任。可以说,理学内部的凝聚力是由激进士大夫对困境下理学理念纯粹性的捍卫获得的。对政治的批判而非妥协是理学最有力的话语武器,大多数理学家顽固的批判者心态,没有随他们走上政治舞台核心而有所转变。这为南宋最后60年的党争埋下了伏笔。史弥远及随后执政的郑清之、贾似道等宰执,未掌权时与理学关系不错,一旦执政就与理学家们的关系很快就陷入紧张当中。

理学的政治思维强调华夷之辨,呼吁天下一统、攘夷复仇。其代表人物朱

^① 多重参考依赖概念反映了决策集团在一个连续性决策过程中的差异化认知及参考点转换现象,收益或者损失,愿望或现实,都可能在特定环境压力和时间点内转化为决策集团的决策依据。参见于海洋、沈朝永:《胜利的失败:多重参考依赖与宣和北伐的决策缺陷》,《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12期,第62—63页。

^② 朱熹在给宰相留正信函中借评价北宋嘉祐、元祐政治得失,指出理学不能与其他学术并存的决心,“前辈有论嘉祐、元丰兼收并用异趣之人,故当时朋党之祸不至于朝廷者,世多以为名言。熹尝谓此乃不得已之论,以为与其偏用小人而尽弃君子,不若如是之犹为愈耳。非以为君子不可专任,小人不可尽去,而此举真可为万世法也。……至如元祐,则其失在于徒知异己者之非君子,而不知同己者之未必非小人,是以患生于腹心之间,卒以助成仇敌之势,亦非独章、蔡之能为己祸也”。参见朱熹撰,郭齐、尹波点校:《朱熹集》卷28《与留丞相书》,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1—1212页。

熹在“论及北虏事”时曾经指出“考之自昔固未有腥羶异类久据中原，”^①另一代表人物陆九渊更直白表示，“然吾人皆士人，曾读《春秋》，知中国夷狄之辨。二圣之仇，岂可不复？”^②高度明晰的对外政治哲学，这对所有理学士大夫包括史弥远都形成强大约束。理学家在后来修史时试图掩饰的一个基本事实在于：绝金一和金之争根本不是理学家与反理学的“群小”的斗争，而是理学内部路线斗争的第一次爆发。四明史氏家族自史弥远之父亲浩时就开始修习陆（九渊）学，史弥远的授业恩师是陆九渊的弟子杨简。后来“绝金派”主力人物之一的袁燮与史家还有姻亲关系。嘉定元年，史弥远主持对庆元党禁时受打击的理学家们“或褒赠易名，或录用其后”。^③嘉定3年（1210年）五月，史弥远推动对朱熹第二次追赠，十一月，史弥远批准朱熹著作进入国子监充当教材。可以说，正是在史弥远的支持下，理学家们真正由在野的学术团体转变为强有力的政治集团。同时，前文提到的“和金派”代表人物程秘是朱熹同乡，其学问承袭自理学家张栻、吕祖谦；另一个“和金派”代表人物乔行简则是理学家吕祖谦的记名弟子。

“和金派”后来与“绝金派”分道扬镳，但两派士大夫有基本相同的学术背景。两场辩论本质上是理学体系内的路线之争。理学家出现了偏重理念纯粹性还是偏重政策可行性的路线分歧，但攘夷复仇作为一种垄断性的框架，构成了双方都完全认同的深层次集体心理结构。

第二，既有研究对决策者与框架间关系的复杂性认识不足。既有研究更愿意假定决策者有单一的倾向（或受框架约束，或进行语义操纵），没有考虑到二者互动更为复杂的情形。事实上，现实中的政治家更可能既主动或被动受到框架的干预，也希望对框架进行语义操纵。对框架的忠诚度，可能与人格特质等心理因素相关，更可能与政治家在决策集团内部的身份差异密切相关，但后者在既有研究中基本是被忽略的。

发生在嘉定7年（1213年）以后的两次辩论尤其是第二次辩论，将决策者对框架反应的差异性体现得极为明显。在影响决策的精英集团当中，宋宁宗本应享有最大的话语权。但是，宁宗史称“不慧”，存在严重的智力问题。他本人对金国怀有仇恨，最初偏向“绝金派”，但他长期退居深宫，对朝政没有影响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33《夷狄》，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195页。

②（宋）陆九渊，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卷35《语录下》，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58页。

③（元）脱脱等：《宋史》卷414《史弥远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417页。

力,也没有足够的智识胆略解决问题,在面临金国攻势时又倒向和金一方。最终,这个国家的最高决策者事实上没有在两次廷辩中起到重要作用。

就“绝金派”与“和金派”而言,“绝金派”的首脑多是左迁的士大夫或清议之臣,籍贯则以福建、浙江为主。他们对政策不承担实际责任,亲族家产又远离前线,因此,有严重的理想主义倾向,对安全压力的敏感度也较低。比如,真德秀在嘉定7年(1214年)提出激进的北伐主张,史料记载当时非议之声很大。他在回答宗室赵汝谈质问时曾以自己是“议事之臣”、不须承担实际职责自辩,但也含蓄承认负责实务的臣子“谋当路”也是合理的。^①周密则记载了当时士林为真德秀所作的辩护,认为“儒者”的责任是“绍道统”,而不是像“俗吏”那样追求事功。^②这些表态意味着理学家们面对理学框架及与之矛盾的外部压力时,立场更倾向于前者。

反观“和金派”的理学士大夫,他们任职枢要或边郡,其职位构成一种强大的身份压力,使他们对局势变化的信号更为敏感。由于无法兼顾理学之士与务实官僚二重身份,“和金派”对理学攘夷复仇框架的态度更为复杂,在两次辩论中不时呈现出立场的摇摆。比如,史弥远虽以擅权留恶名于史册,其在位时宁宗、理宗几成虚君。但史同样以理学士大夫自诩,一旦宁宗明确表示赞同真德秀的绝金岁币主张,史弥远能做的最大努力就是再次试探一次宁宗,而不会公然违逆圣意。^③又比如,最先主张和金御蒙的程秘,在蒙古趁宋金战争之机进入宋境后,无奈接受了新的边防态势,率先提出了默许边臣尝试联蒙的方案。^④程秘在奏折中强调,他不是转向支持联蒙,而是朝廷无法承受同时与金蒙开战的后果。这也是一个务实官僚面对战局发展所作的不得已反应。

① 文忠真公尝与赵公汝谈相晤。起公启文忠曰:“当思所以谋当路者,毋徒议之而已。”文忠答以“公为宗臣,固当思所以谋。如某不过朝廷一议事之臣尔。”参见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甲集(文忠答赵履常),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6页。

② “先生绍道统,辅翼圣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愚民无知,乃欲以琐琐俗吏之事望公,虽然负天下之名者,必负天下之责。褚币极坏之际,岂一儒者所可挽回哉,责望者不亦过乎。”参见周密:《癸辛杂识》前集(1卷)《真西山入朝诗》,中华书局(点校本)1988年版,第163页。

③ 嘉定7年(1213年)8月真德秀面圣时向宁宗奏报,“虏人既有迁都之报,旦夕必须来索币。臣窃以为不可与。”宁宗明确回复,“不当与。”史载“玉音颇厉,异于常时”。这给以忠贞自诩的史弥远沉重压力。史弥远在几天后装作不知道宁宗的态度,试探的奏报宁宗,“从臣刘和、李珣,皆有文字谓不当予币。取自圣裁。”宁宗回答到:“真德秀亦曾说来。”史弥远确认了宁宗的意向,遂退居幕后,让其僚属出面反对绝金之策。

④ 程秘提出“鞑鞬所当结,豪杰所当檄,边将自为之,朝廷无与焉。成则享大利,否亦无损于毫毛,用力寡而成功倍。否则边事一开,将不止一残虏而已。”参见《洺水集》(影印版文渊阁四库全书)卷4《边币议》,第7—8页。

总体而言,对金政策辩论的双方,基于攘夷复仇的共同理学信仰及宋金长期战争所积累的“共同沉没成本”,在情感层面都希望看到金的衰落乃至灭亡。但“儒者”与“议事之臣”的差异导致二者所从事政治活动及政策后果间的关联性绝不相同。^① 这种差异最终导致理学的垄断性框架对两派官员的认知及选择的影响出现明显区别。

2. 新的理论假定:框架垄断控制决策的逻辑。对嘉定年间两次辩论的反思,可以发现,决策框架对决策者的影响需要基于历史情境做更全面的阐释:

首先,框架垄断的程度与其相对于权力的独立性成正向关系。与心理学实验的情景设定相反,政治生活中不存在绝对意义的垄断性决策框架,语言的竞争永远存在。此时框架垄断不意味着替代性框架消失,而是后者无法单纯通过语言层面的辩论获得决策者/集团的支持。毋庸讳言,垄断性框架和替代性框架都可能借助权力维护或达成自身的语言优势,但是,决策框架总体上反映的还是决策集团对特定因果机制的稳定忠诚。框架间的低竞争性最终会降低权力的干预能力。随着框架垄断程度的加强,它会建构出超越决策者个体意志的、被政治—社会结构共同接受的思维路径。这制约了权力实施语义操纵的能力。而决策者转而需要通过迎合而非挑战垄断性框架,来实现自身的意图,这种迎合还不总是可以获得成功。^② 与之相对的是,其他政治主体可以凭借其对垄断性框架更纯粹的信仰和遵循,获取与自身政治地位不相符的话语权。

其次,垄断性框架通过反向的语义操纵,限制了权力与替代性框架结合的可能。如前文提及,语义操纵反映了决策者的控制冲动。在垄断性框架不能反映决策者意志时,扶植替代性框架构成一政治操纵的办法。但是,决策框架对自身因果机制的忠诚会“偏离甚至抵制决策者及其顾问描述特定结果的方式”。^③ 当垄断性框架存在时,它会同样利用语言操纵的方式抵制来自权力与替代性框架的结合。这种反向的语言操纵表现为一种有针对性的框架强化行

^① 于海洋:《注定的失败:沉没成本与南宋对金战和困境》,《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年第5期,第68—69页。

^② 通过研究美国在1991年“沙漠风暴”行动案例时发现,老布什总统最初的“石油—国家安全”决策框架试图获得国内支持时效果很差,于是,老布什及其幕僚迅速转向“萨达姆·侯赛因袭击科威特和他自己的人民的人道主义代价”框架,来争取民众支持。参见 Alex Mintz and Steven B. Redd, “Framing Effec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95.

^③ William A. Boettcher III, “Military Intervention Decisions Regarding Humanitarian Crises Framing Induced Risk Behavior,”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48, No.3, 2004.

为,通过使用带有特定倾向的表达、选择性呈现信息等方式,垄断性框架唤起决策主体及民众的负面情绪,在认知层面对权力与替代框架的结合进行系统性的归谬。由于决策必须考虑合法性及认同问题,只要反向语义操纵有足够的说服力,权力就无法抛开垄断性框架。

再次,垄断框架内语言分歧的解决,与既有框架同各路线的“认知一致性”(Cognitive Consistency)程度有关。“问题—解决方案”因果机制的复杂性,使垄断框架内也可能存在路线竞争。此时,垄断框架的作用类似于多元启发理论中强调的基于维度(dimension-based)的原则,推动决策者放弃在关键维度上不符合最低标准的方案。^①在排除一些方案后,剩下的方案不能算做替代框架,因为它们遵循类似的逻辑,只是基于对外部压力的反应出现选择差异。在本文研究的案例中,理学显然构成一种垄断性框架,但理学家们仍然会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出现“和金”与“绝金”的差异。每种具体路线的出现,都意味着对垄断性框架的某种修正。在这种情况下,修正方式和程度会影响到路线对决策者的说服力。由于决策者总是致力于维护认知系统平衡,对垄断框架存在高“认知一致性”的路线,倾向于将新信息纳入框架规定的因果机制当中,使其最大限度符合垄断性框架的原有逻辑及预期。^②低“认知一致性”的路线,则对外部环境传递的特定信号更为敏感,愿意尝试突破既有框架的约束。决策框架垄断程度很高时,高“认知一致性”的路线通常会获得更多的支持。

3. 理学主导下的框架垄断。理学的话语影响力自嘉定元年后能够迅速膨胀,垄断了南宋政治生活的叙事逻辑,与当时特定的历史与政治形势有关。南宋建立于靖康之耻的巨大阴影之下,立国以后政局动荡,强敌环伺。面对艰难的局面,执政者进取如虞允文、保守如史弥远都无所作为,以士大夫为主体的精英集团内充斥着严重的危机感和挫败感。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理学为士大夫阶层解决了至关重要的发展道路问题。通过“内圣而外王”的哲学观,理学在语言层面将内政外交统一在一起:对内,程朱理学强调刷新朝政、进君子而

^① Alex Mintz, “How Do Leaders Make Decisions? A Poliheuristic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48, No.1, 2004.

^② S. Fiske and S. E. Taylor, *Social Cognition*, New York: MacGraw-Hill, 1991, p. 469.

退小人,通过道德之士主政实现大治^①;对外,理学相信国内大治自然就可以申中国之志,报二圣之仇。真德秀在嘉定6年(1212年)的《祈天永命疏》对理学视野下内外政策的联动性进行明确总结,“以祈天永命为心,亲信仁贤,修举德政,则国势屹然有泰山磐石之固,虽百女真,其何能为”。^②理学以“群贤进用”为核心,在外部威胁、政策选择间建立了一套高度简练、明确而具有鼓动性的因果机制。这一决策框架既有乐观坚定的政治承诺(大治、攘夷),又有明确的政策手段(进君子而退小人),更重要的是士大夫阶层在该框架下被赋予了最重要的角色(集体执政)。理学框架加强了国家精英阶层的凝聚力和使命感,振奋了萎靡的民心士气,为国家抵御外侮奠定了坚实的心理及组织基础。从这一意义上讲,理学成为一种垄断性决策框架有其必然性。

但是,理学主导下的决策框架也有非常明显缺陷,垄断地位使其根深蒂固的认知偏见无法修正,进而影响了两次政争的结果:

首先,理学框架有内重外轻、内主外辅的倾向。西方决策体系总体上有明显的内外分野,“决策者可能不会将一个维度(例如国内政治)的得失视为另一个维度(例如外交政策)的价值决定因素”。^③理学框架显然不是如此。安内而攘外的决策逻辑,使理学家对外部环境发生的变化麻木迟钝。从当时士大夫阶层往来的书信及公开的奏疏当中,可以看到,理学家们总体上没有全面了解周边安全态势的自觉,真正“知边事”者寥寥无几。“绝金派”对蒙古的幅员、战法、军力、政策都极度缺乏认识,对金国抵抗蒙古的战绩也知之甚少。激进的理学家中在讨论对外事务时,视角却专注于国内。把所有外敌都泛泛称为夷狄,忽视其巨大差异,这对只是次等强国的南宋而言是一种无法承受的危险。毕竟,安内而攘外的逻辑在面对那个时代最强大的征服者蒙古时是不成立的。

其次,理学框架带有重道德轻政策的倾向。理学框架把去群贤执政视为政策成功的核心,其认知还停留在提拔贤能后问题自然解决的层面上,因此,

^① 朱熹在评价嘉祐、元祐政治得失时指出,“非以为君子不可专任,小人不可尽去,而此举真可为万世法也”。参见朱熹撰,郭齐、尹波点校:《朱熹集》卷28《与留丞相书》,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1—1212页。

^② 真德秀《除江东漕十一月二十二日朝辞奏事劄子一》,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12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13页。

^③ Jeffrey Taliaferro, “Power Politics and the Balance of Risk: Hypotheses on Great Power Intervention in the Periphery,”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25, No.2, 2004.

对务实派的官僚展开了反向的语义操纵：嘉定7年（1213年）以后的两次辩论，钱法（财政）、军械、人事、（军队）编练等若干对战和之策至关重要的议题被“绝金派”排除在框架以外，理学家把议题转向明辨贤愚、人事更替等他们熟悉的领域。这种忽视具体政策效果的思维，这反映了一种典型的认知偏见，削弱了实务在框架中的权重。

再次，理学框架包含了党争与分裂的逻辑。由于理学家的施政理念把君子一小人的进退视为国家政治的核心，其框架蕴含了不妥协的斗争逻辑：激进的理学家以坚持纯粹的道德立场为荣，鄙视政治妥协；党争不再单纯的争权夺利，而是君子一小人不能并立的自然结果。理学家们往往主动掀起党争，将其视为刷新政治、解决问题的务本之策。

回顾嘉定7年（1213年）后的两次辩论，第一次辩论当中“绝金派”指责史弥远“幸安”“苟安”^①的措辞是温和的，只算对“和金派”有分寸的警告。在第二次辩论中，政争的烈度明显升级：袁燮等人主张多设宰执以分史权势，已经超出政策讨论的范畴，意味着理学家们意图清算现任宰执、寻找新的政治代理人。理学家的反向语义操纵，目标直指切割史弥远与理学的关系、否定史弥远相权的合理性。周密在总结南宋太学政治地位时曾指出，“天下公论，多归两学，公论一鸣，两学雷动”。^②袁燮、萧舜咨利用对国子监的控制，策动学潮，鼓励太学生朝野串联，形成士大夫阶层对“和金派”尤其是史弥远专权的严厉批评。此外，卫泾、魏了翁、丘寿隼等理学名臣自嘉定7年—11年（1213—1217年）开始纷纷上书，为已去世的理学先贤们请谥。在宋金战争期间，理学家们不经过宰相独自策划的请谥浪潮极具政治象征意义，它成为理学家整合士大夫阶层精神世界、推动其认知一致性的重要举措（史弥远当年就是通过追赠朱熹获得理学内的政治领袖地位的）。史弥远犹豫再三，在拖延两年后批准了对二程及周敦颐的追谥。此举表明理学家已经实现了与史弥远势力的剥离，加强了该阶层政治上的独立性。理学家付出了沉重的政治代价，大量理学臣子被贬，但他们成功在语言层面捍卫了理学框架的垄断地位，被理学彻底否定的恐惧逼迫史弥远做出让步。回顾嘉定7年以后的两次辩论，理学家提出的政

① 真德秀指责史及“和金派”官僚“不深惟长算，而一切幸安”。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万有文库本）（卷5）《江东奏论边事状》，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87页。

② （宋）周密：《齐东野语》（卷19）《嘉定宝玺》，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12页。

策方案缺陷明显,但他们的路线与垄断性框架形成了强大的认知一致性。这使新的问题(蒙古崛起)被置于旧框架(攘夷)中寻求解决方案,外部危险信号的意义被垄断性框架扭曲和淡化。同时,双方辩论的核心逐渐偏离对金之策主线,被语义操纵至决策集团重组上。自此理学与务实官僚的裂痕常态化了,理学家们开始更强烈地推动其惟道德化的决策框架直至南宋灭亡。

4. “和金派”替代性框架的失败。如前文指出,“和金派”与“绝金派”同属理学士大夫集团,其对理学框架只存在接受程度的差别,而没有摆脱这一框架的可能。在一个明晰的“内圣而外王”→“安内而攘外”垄断性框架内,和金路线提出的方案既与理学框架的认知一致性程度较低,又无力创造出有价值的替代性框架,自然无法在语言层面获得优势。

第一,“和金派”的政策构想并未形成积极合理的替代性框架。史弥远在战端重开不久即开始谋求重新议和。《宋史·崔与之传》载:“金人入境,宰相连遗与之三书,俾议和。”^①“和金派”官员一担心蒙古崛起,二担心金国反噬南宋,因此决定继续支付岁币,让金充当宋的安全屏障。这一立场相较于“绝金派”的主张更契合边情。但一方面,“和金派”的设想仅是简单的维持岁币、不背刺金国而已,没有上升到战略高度,考虑如何应对蒙古这样凶恶的敌人。金国以河南一隅之地,维持千里长的“关河防线”顽强抵御蒙古15年,战争后期民穷财尽、国力枯竭。至嘉定12年(1219年),南宋5年扣发的岁币累计不过“近二百万匹”,^②这样的金额即便全部交付金国,也不足以支撑金国抗蒙。此外,史弥远派遣政敌兼议论之臣真德秀访金,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史对宋金关系的升级并无特别期待与规划。另一方面,“和金派”对金蒙战争的态势掌握不足,影响了其政策的说服力。南宋朝堂的两次辩论时期,也正是蒙古对金战略的调整时期。第一次对金政策辩论前正值蒙古对金攻略的高峰时期:嘉定4年(1211年)的蒙军攻势,迫使金国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放弃了对黄河以北的控制。出使金朝的南宋朝使臣见到:“(蒙古军)所过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马畜皆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郭瓦

① (元)脱脱等:《宋史》卷406《崔与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259页。

② 程秘:《程端明公谥水集》,《宋集珍本丛刊》卷15,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140页。

墟。”^①这些景象传回南宋使“和金派”的主张显得不具说服力。嘉定10年(1217年),成吉思汗基于“策金不能国”的判断放弃迅速灭金的决策,将攻金使命转交给部将木华黎,本人转而为西征花刺子模做准备,这一决策使蒙古攻金力量减弱,金国著名的“关河防线”也基本建设完成,双方战争进入以互有胜负为特征的新阶段。^②南宋对金蒙战局的重要变化并不了解,无论“绝金派”还是“和金派”都基于旧的情报进行辩论,这更加剧了“和金派”说服“绝金派”的困难。在金衰蒙兴的大时代背景下,史弥远及其他“和金派”官员战略意图保守短视,所期望最多不过是能置身事外、旁观金蒙互斗。“和金派”既未思考过建立正式的抗蒙同盟,对金进行全面军事援助等进一步措施,也没有下决心北伐金国,抢先战局地理形胜之处抵御蒙古。“和金派”的框架不及长远,缺乏对复兴国家及周边形势的通盘考虑。自然无法对理学安内攘夷的宏大志向形成挑战。

第二,“和金派”在理学框架内谋求部分修正政策路线,不以推翻垄断性框架为目标。嘉定元年(1208年)以来,史弥远一直以理学的支持者和保护人的身份出现,绝金之议成为史弥远与理学家们第一次公开的全面冲突。史弥远和支持者很清楚南宋的脆弱性,又无法拒绝理学政治哲学对自身的影响。面对更为激进但也更为符合理学攘夷大义的“绝金派”,史弥远可以打击真德秀、袁燮等当事人,却没能力在精研理学思想的士大夫集团内,以话语操纵的方式否认前者观秉持的叙事框架。反过来,史弥远虽然权势滔天,但他和他的伙伴们极力避免被理学士大夫们在学术和政治层面彻底否定,与理学决裂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史弥远在第一次辩论前曾经试图提拔真德秀,在宋金战争爆发后同意追谥理学先贤,罢黜了提议处罚“绝金派”的亲信胡榘,并最终倒向“联蒙灭金”路线。有过诛杀权相(韩)、操纵废立(济王案)经历的史弥远,在这两次辩论中表现的软弱和沉默是空前的,其和金立场属于理学框架内的路线之争,而非要提出与理学彻底决裂的替代性框架。最终,史弥远的独裁不但没能使其完成对金政策的语义操纵,反而成为他被理学框架攻击的弱点。在付出巨大的政治代价后,“和金派”屈从了理学主张的对金决策框架。

① (宋)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9《鞑鞑款塞》,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850页。

② 赐大驾所建九旂大旗,仍谕诸将曰:“木华黎建此旗以出号令,如朕亲临也。”参见(明)宋濂:《元史》卷119,《木华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932页。

结 语

通过决策框架这一分析工具,本文对南宋嘉定7年(1213年)以后两次对金政策辩论的过程进行了还原。这种结合在理论和历史两个方面给了我们启示:

在理论层面,认知理论在解释复杂的政治决策时,如果不和政治学研究范式结合,解释力十分有限。决策框架为洞悉政治领袖(集团)在风险决策时的认知偏好/偏见,提供了有价值的分析视角。但是,重大政治决策可能是所有决策类型中受规制、程序及传统因素影响最强的,决策者(集团)的认知独立性与心理学实验假定的相差甚远。重大的决策结果往往“不是(作者注:决策者)有目的的选择,而是规模庞大的集合体根据固定的行为规则而运作的‘产品(output)’……政府通过其不同部门的组织和机构处理信息的过程来确立不同的政策选项,评估其后果”。^①将框架认知嵌套至决策程序和政治制度当中,探讨政治制度、传统及权力与框架的复杂互动关系,才能使该范式对重大政治决策具有强的解释能力。

在历史层面,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传统为框架垄断提供了深厚的历史与政治土壤。理学大治而攘夷的决策框架,使国家重大决策出现了强烈的低估可行性而高估合法性的趋势。从积极角度来说,南宋在金国灭亡后独自抵抗蒙古45年,抵抗的时间长度在蒙古征服史上前所未有。士大夫集团高度的道德化倾向,成为国家凝聚力与牺牲精神的来源。但是,决策框架垄断程度过高,也严重限制了框架的灵活程度和创新性。在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或挑战时,理学士大夫阶层的高度同质性制造了强大的回声壁效应:对新信号(蒙古崛起)的迟钝,对旧框架(攘夷复仇)的僵化认同,使国家难以进行必要的政策反思,回旋调整空间随之收窄,增加了战略失灵或僵化的风险。在理学框架的垄断根深蒂固时,即便决策者(如史弥远)已经意识到攘夷复仇并非当时战略的焦点,也无力对抗强大的士大夫阶层,调整政策方向。这种悲剧性的决策失灵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反复出现,是人们反思中国政治传统时必须注意的。

^① Graham Allison and Philip Zelikow,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New York: Addison-Wesley Educational Publishers Inc., 1999, p. 5.